

《淮南子》北宋本流传考辨*

李秀华

内容摘要:北宋本是《淮南子》已知古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刻印于宋仁宗朝(1023-1064),是一种混有许慎注和高诱注的拼合本。两宋时期,流传较广,并开始为藏书家收藏。元明时期,却渐成孤本,被锁于深闺。清代前中期,其传播迎来活跃期,不但相继为曹寅、黄丕烈等名家收藏,而且走出深闺,日益凸现其校勘价值。晚清民国以来,一度活跃的北宋本又跌落冷宫,封藏在杨以增家族的海源阁达70余年。1929年为日本人购得,转藏大连图书馆,后来可能被转运至前苏联,或毁于战火。就其渊源看,北宋本与日本所藏唐钞本及苏颂所见七本,在祖本上应存在关联。就其流变看,其影响有限,仅有三种影钞本,即顾广圻本、陈奂本和刘履芬本。前两种是影写原本,后一种是影写陈奂本。

关键词:《淮南子》 北宋本 孤本 影钞本

在《淮南子》现知的古本中,北宋本可谓至精至善之本,受到了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黄丕烈(1763-1825)、顾广圻(1766-1835)等人的一致推崇。因此,详细梳理和研究北宋本的版本源流、流传历史等问题,在《淮南子》版本研究中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然而,关于北宋本的版本情况,目前学术界仅有一些粗略介绍^①,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究和探讨。

一、北宋本的产生及版本特征

“北宋本”一名,明确见于清代学者陈奂(1786-1863)所撰的题识。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淮南子》学史”(16BZW088)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一书中,第二章第二节“北宋小字本系列”简单转述了美国学者Harold D. Roth教授的部分研究成果,但缺乏具体的文献材料与考证。见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75页。

云：“此北宋本。旧藏吴县黄尧圃百宋一廛，后归同邑汪闾源家。”^①缘何确定是北宋之本？学者悉据其中的避讳字而定。“匡”、“筐”、“敬”、“撇”、“境”、“镜”、“殷”等字，皆为宋太祖时期(960-976)明令需要避讳的字；“玄”、“弦(絃)”、“眩”、“炫”、“朗”、“恒”等字，皆为宋真宗时期(997-1022)明令需要避讳的字；“贞”则是宋仁宗时期(1023-1064)明令需要避讳的字。在此本正文之中，这些字均以缺笔形式进行避讳处理^②。“曙”乃宋英宗名讳，“頊”乃宋神宗名讳，而北宋本对此皆未作出任何形式的避讳处理。根据古代避讳的历史规律，几乎可以断定北宋本就是产生于宋仁宗朝。

除了避讳字这一依据外，北宋本所具有的部分版本特征与当时学者的描述基本一致，这也可以作为辅证。苏颂(1020-1101)于宋仁宗嘉祐四年至六年(1059-1061)，担任集贤院的编定书籍官。在此期间，他校理、编定过《淮南子》，写了一篇名为《校淮南子题序》的序文。序文云：“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训叙，题卷仍各不同，或于《解经》下云‘许慎记上’……参差不齐，非复昔时之体。”^③北宋本也有高氏训叙，除卷十、二十一外，卷首皆题“淮南鸿烈解”，其下均有“许慎记上”字样。这一版本特征与苏颂的描述几无差异，可证北宋本的出现与苏颂任职集贤院的时间非常接近。

清代藏书家杨绍和(1830-1875)在收得北宋本之后，将它著录在《楹书隅录》一书。该书卷三详细描述了北宋本的主要版本特征：

北宋本《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每半叶十二行，行大二十二字、小二十五字。有“王氏彦昭”、“王氏家藏”、“棟亭曹氏藏书”、“百宋一廛黄丕烈印”、“复翁”、“顾千里经眼记”、“汪士钟印”、“闾源”、“三十五峰园主人”各印。每册签题“《淮南子》，许叔重注，北宋本第几册”。每卷第二行题“太尉祭酒臣许慎记上”，“慎”字惟卷十八缺笔，当是修补之叶。^④

从每册的题签看，把北宋本分作十二册一函，肯定是宋亡以后的藏书家所为。北宋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中字大者为正文，字小者为注文。由于每半叶行数较多，字体又小，故学者多谓之小字本^⑤。黄丕烈说：“此书宋刻字既小，又多

①方勇主编：《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2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②《天文训》“蚕珥丝而商弦绝”之“弦”，影钞本未见缺笔，但注文则缺笔补之。

③苏颂：《苏魏公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008页。

④杨绍和：《楹书隅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1页。

⑤顾廷龙《唐宋蜀刻本简述》云：“一般的十一行、十二行，自不能与八、九行的大字本相比，可以称为中字本；十三、十四行的则应以小字本名之。”（《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71页）若按这个标准，北宋本应属中字本。

破体,并印本漫漶处,故校难。”^①不仅指明了北宋本是出自刻版印刷,还道出了其字小的特征。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也特意在“淮南子”条目下注明“小字”。可见,北宋本属于小字本,已成为清代学者的共识。根据杨氏的描述,北宋本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辗转换了多个主人,并且出现过破损。其第十八卷第一叶的撰者题名与其它各卷略有不同,“许慎”的“慎”字缺笔,这是该叶被修补或替换的证据。

作为宋刻本,北宋本在《淮南子》的古本系统中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北宋本原本至今下落不明。庆幸的是,清代学者留下了三种基于北宋本的影钞本。通过这些影钞本,北宋本的其它一些版本特征亦可为我们所了解。首先,北宋本的书名题作“淮南鸿烈解”,虽与苏颂所见七本的书名皆题作“淮南子”不同,但其单鱼尾版心内同样题作“淮南子”。其次,北宋本前有高诱的叙文,题名为“淮南鸿烈解叙”,其末尾直接与第一卷卷首相连,同在一叶。再次,北宋本的第十卷卷首名题作“淮南鸿烈间诂第十”,第二十一卷卷首名题作“淮南鸿烈要略间诂第二十一”,其余十九卷的卷首名皆题作“淮南鸿烈解卷第X”(X代表卷数),二十一卷的卷尾名均题作“淮南鸿烈解卷第X”(X代表卷数)。

尽管各卷皆署名许慎,但北宋本自身的特征清晰地表明,它是一个拼合本,其注文是许慎注与高诱注的混合体。从卷首名看,第十卷、第二十一卷皆有“间诂”字样,无疑同属一个版本系统,而其余十九卷作“淮南鸿烈解”,其版本当别有所属,故北宋本为拼合本的痕迹明显。从高诱叙文与署名许慎的不统一看,北宋本的注文是许高二注混合体的痕迹也一样明显。苏颂曾说:“臣某据文推次,颇见端绪,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题篇’之语,其间奇字并载音读。许于篇下,粗论大意。”^②对照北宋本,其《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汜论训》《说山训》《说林训》《修务训》十三篇的解题均有“故曰”、“因以题篇”之语,而《繆称训》《齐俗训》《道应训》《诠言训》《兵略训》《人间训》《泰族训》《要略》八篇的解题均无此二语,只是粗论大意。推此而言,北宋本的注文为许高二注混合体,与苏颂所见七本相同。

二、北宋本在宋明时期的流传

两宋时期,北宋本曾广泛流传,应用于士人之间。北宋道士陈景元(1024-1094)《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引《淮南子·道应训》“石乞入曰”及“楚军恐取吾头”二句,皆与北宋本相同。而“石乞”、“楚军”,后世所有存世古本分别作“石乙”、“楚君”。这说明陈景元所据版本应是北宋本,或至少是与北

^①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

^②苏颂:《苏魏公文集》,第1008页。

宋本有同一祖本的版本。南宋学者杨齐贤《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十四引《淮南子·本经训》“太清之治”，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引《淮南子·道应训》“于是饮非瞋目勃然”，皆与北宋本相同。而“治”、“瞋目”，后世所有存世古本分别作“始”、“瞋目”。这表明，南宋之时北宋本仍然在士人中流传和应用。

据《楹书隅录》所记，北宋本钤有“王氏彦昭”、“王氏家藏”两枚印章。由于文献不足，王彦昭的个人情况不明。据现有文献查索，自宋以后历史上符合“王彦昭”这一称呼的约有四人：王汉之（1054—1123，字彦昭）、王彦昭（生卒年不详，僧人）^①、王克明（1128—1194^②，字彦昭）、王鉴（1427—1471，字彦昭）^③。就生平材料而言，这四人中王汉之、王克明收藏《淮南子》的可能性最大。王汉之是衢州常山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王介乃当时著名诗人，曾任秘阁校理。他自己亦饱读经史，学识渊奥，被朝廷进封龙图阁直学士、延康殿学士。北宋本问世于宋仁宗朝，为王汉之所收藏，也属情理之事。王克明原是饶州乐平人，后迁居湖州乌程县。他幼时体弱，立志自学医书，遂精通医道，累任朝廷医官，成为当时名医。又据杨绍和所述，北宋本唯第十八卷首页的

①据南宋僧人祖琇《僧宝正续传》卷四：“（真觉禅师）客退必秉炬开卷，于宗教之书，无所不读。初在金陵，大师王彦昭，尝请益雪窦所谓‘三员无事，道人孰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0页）真觉禅师卒于绍兴五年（1135），可知僧人王彦昭主要生活在此年前后。

②这一生卒年，是依据《钦定续通志》考证《宋史》本传“绍兴五年卒”为“绍熙五年卒”推算而来。《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八十二云：“《宋史》本传称克明为绍兴、乾道间名医。考乾道为孝宗年号，若克明以绍兴五年卒，安得有名乾道间耶？又考张子盖救海州，据《宋史·高宗本纪》系绍兴三十二年事，于时克明尚在，其非卒于绍兴五年可知。‘兴’字为‘熙’字之讹，今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0页）绍熙乃宋光宗赵惇年号，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若以此为据，则王克明的生卒年为1128—1194年。若以《宋史》本传为据，则王克明的生卒年为1069—1135年。然而，绍兴是宋高宗年号，乾道是其继承者宋孝宗年号，《宋史》所谓“绍兴五年卒”显然与前述相矛盾，当误。《宋史》本传主要取材于叶适所撰《翰林医痊王君墓志铭》，而叶适（1150—1223）生活在宋孝宗、光宗、宁宗朝，与王克明当有交集。故本文取用《钦定续通志》之说。

③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三十《中宪大夫延安太守王公墓志铭》云：“予友太原王公彦昭，以劲气直节闻天下。自为御史，謇謇不自恤，至贬县令，迁郡守，其所以事上临下者，劲直不少衰。士大夫识与不识，闻其名，皆知其为贤也。成化十有七年，予持宪节宣抚山西，公歿且葬十馀年矣。其子纲知予与公为同年友，以状来乞铭。呜呼！公，予益友也，不敢靳也。顾不腆之辞，不足使公不朽也。公讳鉴，彦昭其字也……成化辛卯，以疾乞谢事，郡人数千欲诣阙，请留。公力止之，乃得归。是岁十二月十九日终于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0—461页）据此，王鉴之生卒年、名字等皆可推知。

署名中“慎”字缺笔,他认为这是修补的痕迹。“慎”字缺笔,显然是避宋孝宗赵昚(1162-1189年在位)之讳。这说明,北宋本在宋孝宗朝应该有过修补或交易活动。而王克明的主要活动恰好集中在宋孝宗朝,加之他喜爱读书,所以王克明也有可能收藏北宋本。但有学者断定王克明是北宋本的拥有者,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①。无论是王汉之还是王克明收藏《淮南子》,“王氏家藏”的印章表明北宋本成了王氏传家之宝,在王家肯定保存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宋亡以后至明末,北宋本鲜有耳闻,渐成孤本。这可以从各版本的文本差异中得到证明。例如,北宋本《天文训》“十二月指子”之“子”,所有存世明本(包括清代庄逢吉本)均作“丑”;北宋本《地形训》“寒冰之所积也”之“冰”,所有存世明本均作“水”;又北宋本此篇“牡土之气”之“牡”,所有存世明本均作“壮”;北宋本《时则训》“以索奸人”之“索”,所有存世明本均作“塞”;北宋本《精神训》“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之“也欲”,“非能使人勿乐也乐而能禁之”之“也乐”,所有存世明本均无;北宋本《本经训》“推移而无故”之“移”,所有存世明本均无此字;北宋本《主术训》“不足者逮于用”之“逮”,所有存世明本均作“建”;又北宋本此篇“知饶馐有馀不足之数”之“饶”,所有存世明本均作“饥”;北宋本《繆称训》“君子惧失义”之“义”,所有存世明本均作“仁义”;北宋本《齐俗训》“处势然也”之“势”,所有存世明本均作“世”;北宋本《道应训》“在其内而忘其外”之“其内”,所有存世明本均无“其”字;北宋本《兵略训》“扞泰山”之“扞”,所有存世明本均作“抗”;北宋本《修务训》“欣若七日不食”之“若”,所有存世明本均作“然”。上述例子表明,北宋本在元明时期为世

^①陈静说:“在讨论北宋原本的流传时,最早拥有这个本子的人被认定是王克明。王克明是在乌程退休的,他拥有的北宋原本就保存在他的家中,而乌程也是茅一桂的合作者温博的家乡。”(《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第94页)。又说:“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茅一桂本里看到,茅一桂的合作者温博是乌程人,而王克明正是在乌程致仕,茅一桂和温博校勘《淮南子》使用的校本之一,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的北宋本。也许,温博从王克明的后人那里借得了这个本子,也有可能他购买了这部书,但是没有在上面钤印。无论如何,北宋原本在王家保存了四五百年,后来落到了曹寅的手中。”(同上,第72页)无论从逻辑还是论据,陈氏之说皆不充分。首先,温博是明万历年间人,距离王克明400余年,虽是同乡,但谁也不能保证王家数百年扎根在乌程县不迁移,故温博从王克明后人借得或购得北宋本只是臆测之辞。其次,茅一桂、温博校刊《淮南子》所用校本中并无明言有宋本,只称“与允文汇藏经钞本,参相校讎”(茅一桂《重校淮南鸿烈解引》,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515页。)。再次,茅一桂、温博所刊《淮南子》,其异文处多与道藏本同,而与北宋本异。如《原道训》:“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近者,往而复反。”此句,北宋本在“能存之此,其德不亏”句之前,而茅一桂本与王溥本、王荃本等本,皆在“迫则能应”之前。若以北宋本作过参校,则决非如此。总之,断定王克明是北宋本的拥有者并无切实的证据。

人所罕睹,且不见用于当时的校书者和刊书者。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北宋本流传到明代已成孤本,一直被藏书家秘藏于高阁。

三、北宋本在清代前中期的流传

有清一代,作为孤本的北宋本迎来了活跃期。不仅几易其主,而且开始在士人中传阅,发挥着独特的校勘作用。据杨绍和所记,清代前中期,北宋本先后经过了曹寅、黄丕烈、顾广圻、汪士钟等藏书家之手。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楝亭。曹氏藏书达3287种,共10万馀卷,其中宋刊本极多,书中皆钤有“楝亭曹氏藏书”印章。其《楝亭书目》著录《淮南子》为:“《淮南子》,旧本,汉淮南刘安著,二十一卷,一函十二册。”^①概称“旧本”,说明曹寅对其年代并无考证。至于曹寅何时、何地、从何人手中将北宋本揽入家中,已不可确考。其《和芷园消夏十首·曝书》言:

十五年间万卷藏,中年方觉曝书忙。遥怜挥汗缤纷处,时有微风送古香。

胡绍棠说:“这组诗是和其弟曹荃《消夏》十首,作于康熙三十一年秋。”^②康熙三十一年,即1692年。此时曹寅35岁,正任苏州织造,其藏书活动已持续十五年。由此可知,曹寅收藏北宋本,必定是在1677-1712年之间。众所周知,收藏古籍珍本需要大量钱财作为后盾,曹氏家族虽贵显当世,但是钱财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曹寅之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二十馀年,曹寅自己也在1690年至1712年间相继担任苏州、江宁两地织造,还兼做一段时间的两淮巡盐御史^③。凭借职务之便,曹寅甚至通过亏空国库的手段为曹家累积钱财^④。清代前期,江浙一带的藏书风气很盛,当时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大都出于这个地区^⑤。因此,曹寅于1690年后在江浙地区,从其他藏书家或书商手里收购北宋本的可能性非常大^⑥。曹

①曹寅:《楝亭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473页。

②胡绍棠:《楝亭集笺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③胡适《红楼梦考证》云:“可知曹寅当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二年时,做苏州织造;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他兼任江宁织造;三十二年以后,他专任江宁织造二十年。”又云:“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亲曹玺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胡适文存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4页)

④参看史景迁著,陈引驰等译:《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109-112页。

⑤参看王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清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71-276页。

⑥巧合的是,王汉之曾于宋徽宗朝担任过苏州、江宁知府,若北宋本为其所得,那此本流落苏州、江宁之地,被曹寅收得亦未可知。

寅死后,曹家迅速败落,所藏之书开始大量散失,其中有不少归于他的外甥富察昌龄。按照惯例,富察氏都会在藏书上钤上自己的印章^①。然而,北宋本并无其印,说明它未曾落入昌龄之手,仍然为曹寅后人所保存。浦起龙(1679-1762)在批校明代刘绩补注本时说:“宋本每叶廿四行,每行廿二字,行中字形不齐等。”^②根据所述特征,这里的“宋本”就是北宋本。可见,曹家时代北宋本便在学者之间传阅,用于校勘了。

继曹寅之后,黄丕烈是北宋本又一位极具声名的主人。黄氏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写的一篇题跋中,讲明了他获得北宋本的由来:“余收得宋刻,系曹棟亭藏书,故五柳主人于扬州得之,以归余者也。”^③五柳主人,即苏州书商陶蕴辉。他常年混迹于书肆,其书多来自于吴铨^④。可知在黄丕烈之前,陶蕴辉是北宋本的拥有者。陶氏在扬州购得北宋本,似乎能说明北宋本就一直存于曹寅后人的手里。因为曹寅人生中最辉煌岁月(担任两淮巡盐御史、主持刊刻《全唐诗》)正是在扬州度过,这个地方显然会留有他珍贵的藏书。那北宋本何时归于黄丕烈呢?查江标所撰《黄尧圃先生年谱》,黄氏大约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开始与陶蕴辉交往。又据钮树玉《匪石日记钞》:“(丙辰)六月一日,到黄尧圃家,观影宋本《荀子》,有缺页。又观宋本《淮南子》、金本《本草》。”^⑤丙辰,即嘉庆元年。此年,钮氏到黄家观摩到了北宋本。故可推知,黄丕烈在1791至1796年之间从陶蕴辉手里得到了北宋本。

黄丕烈最尊崇宋本,自号佞宋主人。其《百宋一廛赋序》云:“予以嘉庆壬戌迁居县桥,构专室,贮所有宋槧本书,名之曰百宋一廛。”^⑥可见,黄氏于嘉庆壬戌(1802)后在北宋本钤上了“百宋一廛黄丕烈印”,把它藏于百宋一廛。嘉庆十一年(1806),黄氏大病初愈,又在北宋本上增钤“复翁”印记^⑦。他还把北

①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棟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董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丛书集成三编》第79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394页)按,“董”,当作“董”。

②方勇主编:《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5册,第393页。

③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第330页。

④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开而旧书颇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丛书集成三编》第79册,第394页)《黄尧圃先生年谱》云:“又按,蕴辉,名珠琳,原籍乌程,移家吴门。”(《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⑤钮树玉:《匪石日记钞》,《丛书集成初编》第57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9页。

⑥顾广圻:《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⑦江标《黄尧圃先生年谱》云:“十一年丙寅四十四岁。先生是年更号‘复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7册,第171页)

宋本写入《求古居宋本书目》^①,希望“子孙其世守之,勿为豪家所夺”^②。但事与愿违,在黄氏生前北宋本就被迫转手他人。顾广圻于嘉庆庚辰(1820)写了一篇跋文,他明确说道:“汪君闾源收藏宋槧《淮南子》,予借读一过而书其后。”^③由此可知,黄丕烈将北宋本转手他人最迟发生在1820年。而嘉庆二十一年,黄丕烈在一篇跋文中表露,他曾用北宋本参校旧钞本。这说明,1816年北宋本仍归黄氏。因此,北宋本必定是在1816年至1820年之间易主于汪士钟。

尽管北宋本在黄丕烈手里仅30年左右,但对其流传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黄氏是首位高度赞誉北宋本的清代学者,为世人重视北宋本开了先河。他说:“子书唯《淮南》世鲜宋刻,故近今翻刻从前校讎皆未及宋刻。”^④又说:

小字本《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每半叶十二行,每行大二十二字,小廿五字,棟亭曹氏旧物也。相传惠松屋绝称明芦泉刘绩补注本,惠尝见宋本者也,其实刘出于正统十年《道藏》,不如宋槧远甚。^⑤

认为不论是新近翻刻的旧本,还是学者赞不绝口的刘绩补注本,都远不及北宋本。黄氏还进一步推动了北宋本的传播,挖掘其校勘价值。当时著名的学者顾广圻、钮树玉等人均到黄家目睹过北宋本,他本人用北宋本校勘二十八卷的旧钞本,断断续续达十六年之久^⑥。

作为北宋本的继任主人,汪士钟虽然不及黄丕烈那样声名远播,但对北宋本的流传作了更为巨大的贡献。汪氏出身富商家庭,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力,其艺芸书舍收藏宋本达到300馀部,在清代藏书家中首屈一指。尽管是以商人身份混迹于书肆,但汪氏对藏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并不以独享孤本为荣,遇到世所罕传的善本,则本着“使数百年来弗克寓目者,今乃可家置一部”^⑦的理想,积极予以摹刻。正是在这种开明思想的指引下,汪氏不仅允许学者入舍看书,还允许学者借书出舍。顾广圻、陈奂能够影钞北宋本,显然都是得益于。自从影钞本出现以后,北宋本的影响日益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假如没有影钞本,北宋本的一切将会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从这个方面说,汪士钟在北宋本的持续流传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①著录为“淮南鸿烈解二十卷,十二册”。(《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15页)原二十一卷,此处未知何故写成二十卷。

②江标:《黄尧圃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7册,第263页。

③⑤⑦顾广圻:《顾千里集》,第334、10-11、129页。

④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第330页。

⑥黄丕烈在1801年9月为旧钞本所写的序跋中说:“暇日当取宋刻正之。”又在1816年4月写的跋文中说:“余既求得,同人怂恿校出,忽忽未有暇也。偶一校及,又中止……前辍校不知几何年,而今兹三月下浣一日始复校此,旬日之间,事阻者三四日,草草毕工,略具面目。”(《尧圃藏书题识》,第330页)

顾广圻虽非北宋本的主人,却是北宋本流传史上一位不得不说的重要人物。他与黄丕烈、汪士钟均有密切交往,这也是他能够在北宋本上钤上“顾千里经眼记”之印的根本原因。顾广圻与黄丕烈最为相知。黄氏曾动情地说:

余性喜读未见书,而朋友中与余赏奇析疑者,唯顾子千里为最相得。岁丙辰,千里借窗读书,兼任雠校。故余所好之书,亦惟千里知之最深。每遇奇秘本为余所未见者,千里必代购以归余。四五年来,插架中可备甲编之物正不乏也。岁辛酉,余四处计偕,宾主之欢遂散。然翰墨因缘,我两人无一日去怀。^①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自1796至1801年以宾主相称达六年之久。这期间,顾广圻为黄氏校勘、代购珍贵古本,自然十分熟悉北宋本。其校记云:“庚申春杪……是岁七月,借得宋槧,细勘一过,校《道藏》为胜,刘绩本以下无论也。后世得此者,尚知而宝之。”^②庚申,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这年顾氏从黄丕烈手里借得北宋本,详细校勘一遍后断言:“此于今日洵为最善之本矣。”^③这一评判与黄丕烈如出一辙。顾氏在嘉庆九年(1804)写成的《百宋一廛赋》中,又重申了这一评判:“高解《鸿烈》,盖云善哉。向贵芦泉,顿成陪台。愤《道藏》之贗鼎,每张目而一欵。”^④希望引起学者对北宋本的珍视。基于这种想法,顾氏二十年后又从汪士钟手里借读北宋本,特意写了一篇长跋文。文中详列北宋本文本优于其他版本的地方,多达52处。且谓:“以上诸条,实远出《道藏》本之上,而他本无论矣。至于注文足正各本之误者尤不胜数,兹弗具述。”^⑤经过顾氏的研究,北宋本的校勘价值也因之进一步凸显。

四、北宋本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流传

与黄丕烈一样,汪士钟保藏北宋本不过30馀年,杨以增(1787—1855)成为北宋本在晚清时期的新主人。至于杨以增何时购得北宋本,其子杨绍和在《楹书隅录》卷三中有明确记载。他说:“咸丰壬子(1852),先公得于袁浦,亟思椘木,以惠艺林。”^⑥袁浦,是江浙相接之地。杨以增在1848年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后,曾大力搜求古籍珍本,江南旧藏大多汇集其手。江标《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目跋》云:

吾郡黄尧圃先生所藏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闳源观察。未几,平阳书库扃钥亦疏,在道光辛亥、壬子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所得,至庚申而尽出矣。^⑦

①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第254-255页。

②③④⑤顾广圻:《顾千里集》,第333、334、10、336页。

⑥杨绍和:《楹书隅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第651页。

⑦曹景英、马明琴主编:《海源阁研究资料》,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第167页。

可知,原属汪氏的北宋本在1852年辗转到了杨以增手里,被秘藏于海源阁。北宋本由此开始了在北方流传的历程。

杨以增之后,杨绍和成了北宋本在杨家的第二代主人。在杨氏的保护下,北宋本幸免于捻军之乱。同治癸亥(1863),杨绍和为北宋本撰写题跋,充分肯定了它的版本价值。他感叹说:

世行诸子,不乏旧帙,惟是书自北宋已有舛脱,《尔雅疏》《埤雅》《集韵》《太平御览》各书所引,往往视今本同误,最少佳刻。若此至精至善之本,实于人间无两,固硕果之懂存者矣。^①

有鉴于此,杨氏两代皆欲“怀铅提槧”,摹刻北宋本而传诸后世。尽管未能“得酬斯愿”,但他详细记录北宋本的版本信息,将它著录于《楹书隅录》之中,也为后人提供了十分权威的版本史料。

杨绍和之后,其子杨保彝(1852-1910)成了北宋本在杨家的第三代主人。他继续奉行“闭关锁书”之策,使北宋本幸免于八国联军之乱。杨保彝晚年开始清理杨家藏书,自编《海源阁藏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分别著录北宋本为“《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北宋本《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可见,晚清七十馀年,虽然历经各种动荡局势,北宋本在杨家依然保存完好。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度保护的行为,北宋本又回到了被锁深闺的封闭状态,无法再嘉惠学林。

杨保彝去世后,其嗣子杨承训(1900-1970)成了北宋本在杨家的第四代主人,也是末代主人。由于时局激烈动荡,海源阁在杨承训手里已经风雨飘摇,大多数藏书毁于兵燹,一些珍贵宋本遭到出售,几乎丧失殆尽。也是在杨承训时期,北宋本被迫流寓各地,最终踪迹全无。

据《山东省教育厅呈报海源阁藏书情形(一)》所记,杨承训曾于1927年夏及1928年10月将大批宋元明版及孤本秘密运抵天津,打算出售^②。北宋本当是在1927年夏运抵天津的。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北宋本,并注云:“海源阁书,丁卯十月廿九日与叶誉虎赴津观书,劳姓送阅,索五千

^①杨绍和:《楹书隅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第651页。

^②此文载:“惟查海源阁现存书籍,为数极属寥寥,访闻海源阁藏书种类繁多,内有《楹书隅录》一套,为海源阁之精华,此书多系宋元明版及孤本,于民国十六年夏曾杨承训秘将此书运津多种,又于十七年阳历十月间运津大批书籍,声言在津招股影印,后未实现,曾于十七年秋经旅津聊城人士在津沽书店内发现代售海源阁书籍情事。”(《海源阁研究资料》,第38页)

元。”^①可知,傅氏1927年10月至天津观书,即见到了北宋本。对于杨氏运抵天津的包括北宋本在内的宋元珍本,张元济曾联合傅增湘几次谋划购买,但因为售价过高而作罢^②。

1929年,杨承训把北宋本售给了出价更高的日本人,日本人将它转运到了满铁大连图书馆。据《日寇侵略东北时期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史料》记载:

1929年(昭和4年)一月,又专拨十万元巨款,派专人到京津沪一带搜买大量中国古籍。其中珍贵的精抄名刊甚多,计有宋版八种,元版十馀种。列简目如下。宋版八种:《淮南鸿烈解》(通称《淮南子》,二十一卷十二册,海源阁旧藏)。^③

酈承铨于30年代初在大连图书馆,也亲眼目睹过北宋本。他说:“铨按所见书叶,为卷第七十一影。有四经四史之参白文方印,大连图书馆藏朱文方

①曹景英、马明琴主编:《海源阁研究资料》,第207页。其著录情况为:“《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许慎、高诱撰。宋刊本,半页十二行,每行大字二十二字,小字二十五字。有顾广圻跋,见《楹书隅录》,不录。钤有曹棟亭、黄丕烈、顾广圻、汪士钟诸印。”

②1927年11月30日,张元济致信傅增湘:“昨得王君九兄来信,谓海源阁有宋元本二十六种,捆载到津出售。并抄来请单一纸。检对《楹书隅录》,均有其书,似非伪托。每种开价少者千元,多者乃至几千元,未免过于离奇。兹抄呈一分,敬祈察阅……《淮南鸿烈解》四千五……以上王君九抄来,云书在天津。”(《海源阁研究资料》,第105页)傅增湘致信张元济:“海源阁书到津廿六种皆得见。二孟一黄为李木老所得,五千元以外,余廿三种让值至七万五千元。叶玉虎欲纠同志集款收之。商量结果,留十五种,还值三万二千元,不成。又数日再商,十三种予以三万九千元(连小费),亦不成。只得作罢矣……十三种如后:北宋本《淮南子》(小字)……此十三种印本皆佳。”(同上,第107页)1929年2月16日,张元济再致信傅增湘:“海源阁书去岁在津发见者,闻李木老买得三种外,余尚未售。玉虎在沪屡次谈及,深虑其流出海外……玉虎谓书十五种,据最近消息四万元似可脱手。明训则以为过昂,尚须磋减。弟以此第书本无定值,既已闲置年馀,除东渡外,国内未必有甚销路,减价之望亦似在情理之中……《淮南鸿烈解》(北宋本,十二行廿二字)六千。”(同上,第109页)

③杨力生:《日寇侵略东北时期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史料》,《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6期,第106页。关于北宋本被卖给日本人一事,王献唐在1930年发表的《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一文中亦有详细描述:“数月以前即有杨氏在天津售书风传,余固不信;以杨氏富有田产,绝不至以卖书为生计也。既而其传愈确,并言售书原因,系今海源阁主人,在津贸易亏折,逼而至此,余仍不信。最后乃传书已卖出矣,有宋槧十二种,最初叶誉虎、张岱珊、梁众异等三人,合出六万元,杨氏不肯出让,乃以八万元间接售于日本人。其经手者,为北平琉璃厂之王某,恍惚迷离,将信将疑。最近展转从北平方面,得其售书总单,为转录于下……北宋本《淮南鸿烈解》十二册 四千八百元。”(《海源阁研究资料》,第67-68页)

印。”^①显然,北宋本是由日本人带到大连图书馆的事实无可置辩。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接管了大连图书馆,在此期间北宋本下落不明。据史料记载,在日本馆长与苏联馆长交接期间,馆藏图书被大量盗运散失与暗自焚毁,宋版图书全部被盗,部分原刊以及稀贵的手稿、舆图和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也被盗走转运甚多^②。由此看来,北宋本极有可能被盗运出国,藏在原苏联某地。然而,至今七十多年来北宋本原本音讯全无,或许20世纪40年代就毁于战火了。

五、北宋本的版本源流

前面分析过,北宋本是一个既有许慎注文又有高诱注文的拼合本。拼合本就意味着北宋本的祖本肯定不止一个。至于其祖本到底有几个,及各具何种特征,则不可考。目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淮南鸿烈兵略间诂》残卷,被传为唐钞本,其年代不晚于北宋本。唐钞本残卷的卷首名题作“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廿”,北宋本第二十一卷的卷首名题作“淮南鸿列要略间诂第二十一”,两者的题名模式显然有相似之处,那么两者的祖本也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另外,苏颂见到的崇文旧书本、蜀川印本、家藏本、集贤本等七个版本,稍早于北宋本,或与北宋本同时。鉴于这些版本均为拼合本,某些特征与北宋本相合,故其祖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也是合情合理的。

与“源”相比,北宋本的“流”就清晰得多了。前文已论述,北宋本自产生以来至元明时期渐成孤本,被锁于深闺。据现存文献可知,清代以前没有出现以北宋本为底本的新版本,北宋本一直如幽井之水,流波不存。这种状况持续到清代才有所改变。开明藏书家黄丕烈、汪士钟开凿了这口幽井,让它流向士人之中,而杰出校勘家顾广圻则逐其流,扬其波,率先创造了一个基于北宋本的新版本。

顾广圻决定影钞北宋本,自然是缘于他对北宋本价值的高度肯定。但事情的直接起因则与王念孙有关。王念孙把《淮南子》的校勘成果送予顾广圻审读,并希望顾氏能摘录北宋本与《道藏》本的异文回寄给他。王引之对此有描述:

岁在庚辰,元和顾涧萍文学寓书于顾南雅学士,索家大人《读书杂志》,乃先贻以《淮南杂志》一种,而求其详识宋本与《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订是书之讹,为家刻所无者,补刻以遗后学。数月书来,果录

^①“七”当是“二”之误。见酈承铨《记大连图书馆所收海源阁藏宋本四种》(《海源阁研究资料》,第191页)。此文1946年7月发表在《文化先锋》五卷二十四期上。文中说:“余十余年前,得大连图书馆此四种书影,当时闻以六万元重价成贸。”故可推知,酈氏于30年代初见过北宋本。

^②杨力生:《日寇侵略东北时期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史料》,第109页。

宋本佳处以示,又示以所订诸条。^①

王念孙的校勘成果也促使顾氏进一步认识到北宋本的价值,遂产生了影钞一个副本寄给王氏的想法。他说:“高邮王怀祖先生尝校定是书,所订道藏以来各本之失而求其是,往往与宋槧有暗合者,将传其副以寄之,必能为此本第一赏音矣。”^②至于何时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已难以确考。尽管如此,其大致时间还是可以推知的。顾广圻表露影钞北宋本的想法,是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而陈奂在道光四年(1824)三月写的一篇跋文中说:“顾涧萍景钞,预大其贾四十金者,即此本也。”^③这说明顾氏的影钞本最迟在1824年春季即已完成。可见,顾广圻影钞北宋本必定是在1820年秋至1824年春之间。查其年谱,顾广圻于1820年前后与汪士钟往来频繁,特别是道光二年(1822)还为汪氏撰写了《艺芸书舍宋元书目序》。所以,更精确一点讲,顾氏应是在1822年左右从汪士钟手里借出北宋本,并加以影钞的。

书成之后,顾氏并未将它寄给王念孙,而是标价40金准备出售,最终为胡雨塘所得。顾氏影钞本不仅高度接近北宋本原本,而且十分精美,被当时的学者用作参校之本^④。顾氏影钞本为胡雨塘购得以后,其流传过程已难以详考。今北京图书馆藏有顾广圻跋语的《淮南子》手钞本,但非全本,仅存十六卷(卷四至十一、卷十四至二十一),其中卷四之首钤有“汪士钟印”^⑤。经仔细比对,此本版式及文本,与后来的陈奂影钞本、刘泖生影钞本完全一致,然字体更加工整秀洁,几可肯定为顾氏影钞本,或其副本。

比顾广圻晚出生二十年的陈奂亦有北宋本影钞本。他在序跋中说:“高邮王怀祖先生属余借录,寄至都中,遂倩金君友梅景钞一部,藏之于三百书

①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77页。对于这件事,顾广圻也有记述:“王怀祖先生以所著《读书杂志》内《淮南》一种见赠,于藏本、刘绩本及此本(指武进刊本)是非,洞若观火矣。己卯小除记。”(《顾千里集》,第333页)但王氏、顾氏所记,在时间上有出入,前者说是1820年,后者说是1819年年底。又《四与王曼卿书》:“宋槧《淮南子》已归此地汪氏,承命借到,校勘一过,实在《道藏》之上,摘其异同各条,汇录呈备采择。”(同上,第122页)

②顾广圻:《顾千里集》,第336页。《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司马贞索隐:“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顾氏所谓“传其副”,即是要制作一个北宋本的副本。

③方勇主编:《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29册,第3-4页。

④道光十四年(1834),陈奂跋云:“顾涧萍翁曾有影钞本,称甚精核,胡君雨塘以四十白金换得之,即士礼旧藏本也。今向雨塘借校,重睹至宝。”(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526页)

⑤此本收录于方勇主编的《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34-35册。

舍。”^①又在十年后所写的另一篇序跋中说：“北宋淮南书二十一卷，此最善本也……高邮王尚书借钞属校，字多漫漶，讎对颇不易易。免与汪道不相谋者也，其书不能稽览，未及过录，常自恨惜。”^②由这两段文字可知，陈免最看重北宋本，虽与汪士钟是同乡，但非同道中人，故关系欠佳，无法亲眼见到汪氏收藏的北宋本，自然也无法亲手影钞北宋本；又因其师王念孙嘱托他影钞北宋本，故不得已请金友梅帮忙影钞了一部。金友梅大约于道光四年完成这个任务，此时北宋本正掌握在汪士钟手里。显然，汪士钟并未羁于私人恩怨而破坏这桩美事。看似一件很普通的事，却成就了北宋本的另一个重要副本。光绪戊戌（1898），陈氏影钞本为莫棠（1865-1929）所得。莫氏题识云：“宋本近在聊城杨氏，予得免硕父家本，出自道光四年影写。恐世间传副不多，亟思重刻而迁延未果。”^③与杨绍和一样，莫棠重刻北宋本的愿望落空，影钞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陈氏影钞本钤有“韶州府印”、“琼州府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莫氏秘笈”、“莫棠楚生印”、“铜井山庐藏书”，今收录在《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29-30册。

在莫棠得到陈氏影钞本之前，江山人刘履芬（1827-1879）在同治十年（1871）就影写了此本，世称刘泖生影钞本。刘泖生的影钞本并不是直接影写北宋本原本，而是以陈氏影钞本为底本影写而来，可谓北宋本之“苗裔”。刘泖生影钞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钤有“涵芬楼”印章，为《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27-28册所收录。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其中收录的《淮南子》即是以刘泖生影钞本为底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八年（1919）影印出版。

总之，北宋本在九百馀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渐成孤本，有近四分之三的时间闭锁书阁，故其传播区域十分有限，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不显著，甚至没有衍生一个与之相关的刻本。只是随着三种影钞本的流传，尤其是《四部丛刊》本的广泛发行，北宋本才“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学者所广泛利用，体现了应有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李秀华，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①③方勇主编：《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第29册，第3、5页。

②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526页。